

12.98

扬中文史资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扬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84

封面题签：
封面设计： 仓道洲

内部发行

1984年12月

扬中县印刷厂承印

《扬中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 一、 在王龙同志革命离家后的日子里…………… (1)
- 二、 袭击伪县府，活捉伪县长…………… (9)
- 三、 我的祖父倪思文先生…………… (14)
- 四、 祝尧三先生…………… (22)
- 五、 水上春秋…………… (29)
- 六、 沧海桑田话扬中…………… (35)
- 七、 洪康燮宰汤事略…………… (40)
- 八、 孟治在扬作恶史撮要…………… (49)
- 九、 活跃的扬中抗日儿童团…………… (55)
- 十、 林家坝之争…………… (58)
- 十一、 八桥徐氏糖坊…………… (62)
- 十二、 抗战前后的长旺桥 (附图) …………… (64)
- 十三、 栏杆桥的变迁…………… (68)
- 十四、 扬中的大门…………… (73)
- 十五、 解放前的西来桥…………… (76)

十六、	营房港“旗人”公产记略·····	(79)
十七、	解放前的讨婆圩·····	(83)
十八、	忆旧社会妇女的悲惨遭遇·····	(85)
十九、	三个九十九间半·····	(88)
	(一)联合乡王家埭的九十九间半(附图)	(88)
	(二)油坊乡六墩子的九十九间半·····	(96)
	(三)长旺乡黄家水圩的九十九间半·····	(99)
二十、	解放前幸福乡的教育·····	(101)
二十一、	解放初期我县的农民业余文化教育	(105)
二十二、	历史上的扬中报刊·····	(111)
二十三、	“扬中民俗”引言·····	(113)
二十四、	扬中的旧婚俗·····	(119)
二十五、	扬中的旧丧俗·····	(122)
二十六、	扬中节日谈·····	(128)
二十七、	生日谈·····	(136)
二十八、	东岳庙·····	(141)
二十九、	新开庵遗闻·····	(149)
三十、	征稿启事·····	(150)
三十一、	勘误表·····	(152)

在王龙同志革命离家后的日子里

日本鬼子入侵扬中之前，王龙在本乡私塾教书。他目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渐产生了革命思想，倾向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王龙外出到管山找革命队伍，准备参加革命。他在那儿停留了两三天就回来了。一天，家里请了手艺人，王龙上街买菜，半路竟被抓走了。原来是本村槽坊姓祝的发现了王龙去过管山，就向国民党军队的贾长富、田传子告了密。田传子、贾长富随即逮捕了王龙，准备在阴柏树（西江边、已圯）杀害，后来又准备在三茅西南的乱葬坑，（现在人民医院所在地）枪杀。但他们知道王龙很能干，又想利用他。于是就把他关在监牢里。这时，我们全家提心吊胆，对这飞来横祸，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婆母急急忙忙赶到三茅，找人打通关节，十天后，人总算放回来了。

这次遭难，进一步坚定了王龙参加革命的决心。他想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只有参加革命，组织人民跟那些吃人的豺狼斗，才是唯一的出路。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本鬼子骚扰扬中，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王龙曾多次对我说：“中国人不起来闹革命，不参加抗战，就要做亡国奴了。做了亡国奴就要永生永世受苦受难了。”三九年四月的一天，他告诉我和母亲，要跟一个盛参谋（按：盛即新四军统战参谋盛威扬同志）到安做念书。后来，他离了家，其实他这次是正式参加新四军去了。

盛参谋当时在我家住了好几天，和王龙谈得非常投机。

那时，我家佃种五亩六分田，耕种的重担落在我一人身上。农忙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忙得连早饭也没空回家吃，总是孩子送点粗粥或是焦糊。邻居看到我实在可怜，有时就帮我拔秧、扒草、摘耙。但是，如果逢到车栽秧水（插秧时田里的水）、插秧、挑肥等重活，就得请工帮忙。那个时候，家中收入全靠田里打的一点点粮食，哪来工钱呢？当时家中有六个人吃饭，自己总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向在上海的舅舅求救，支持一点。这年的寒冬腊月，我生了个女孩子，月子里，哪里得到调养休息呢？因为婆母为儿子外出，不知音信，经常日夜忧愁落泪，身体很差，家中的活计无人料理，所以生养了几天，我就下地干活了。第二年春天，我才知道王龙已在丹徒段家桥新四军“新兵接待站”担任领导，负责接待前来参加抗日的青年。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农历腊月初三）日寇分十三路进攻扬中以后，五月的一天，有个姓朱的汉奸带领着几十个鬼子及伪警察大队来到我家。他们端着枪冲进屋内，一个家伙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问：“你就是王隆恩（按：王龙同志的谐音）的老婆吗？”我说：“不是？”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人就左右开弓两个耳光，打得我两眼发花，只听他骂道：“妈的×，你不是王隆恩的老婆？”他们把我拉到门外，用洋铐把我铐起来，然后进屋搜查。这帮强盗把我家里稍微好点的东西抢光，还准备放火烧房子。这时我和婆母十分焦急，房子烧了就没法活了。于是恳求他们不要放火。其中有一个叫顾正本的，因和王龙是熟人，他看我们婆媳可怜，对汉奸朱××说：“不要烧房子吧？人家床上还有个吃奶的孩子呢！”结果房子保住了，我抱着孩子被他们带到三茅。

下午，一个高个子鬼子，名叫冈崎的，走上来就打了我几个耳光。然后就追问王龙的情况，说如果不说出王龙的下落，就让我坐牢。冈崎审问后，又有伪警察大队长周广法、反动警察所姓卜的家伙等七个人审问了我。审问中，我只说“我不晓得王龙的情况， he 说是跟人到安徽读书的”。审问后，我被关在拘留所里，这一天，我米水没沾牙，还是个难友（按：即地下党员于圣茂同志）看到我又饥又累，精疲力尽，还有个孩子，劝我吃了他一碗粥。夜里，我抱着孩子坐在一张破芦席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我又被他们七个人审问了三次，逼迫我供出王龙的活动情况，并威胁我：“王龙根，你要是不交出王隆恩，就坐牢一直坐到死。”坐到死就坐到死，我死也不说。

在拘留所里，我们母女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牢里面又脏又潮，虱子、跳蚤咬得人日夜不安。敌人怕我们上厕所逃跑，每天只准我们吃两餐。几个月的时间，多亏乡亲曹成安每天送茶送饭，我母女才勉强活下来。

在我被抓的时候，大儿子侠荣十岁。他见反动派抓走了娘，到处哭喊着“姆妈！”一直哭到翁家塘奶奶家，有熟人把他领着送到他爹那儿，王龙把他托养在中心沙顾维衡家，做顾的干儿子，改名跟舅舅姓张，叫张洁，就在那儿读书。这年冬天没人回家拿棉衣，奶奶舍不得孙子，要他回来，几次没造成，后得知侠荣身上生了冻疮，结果还是托人送去，可惜所托之人又未送到……

我在监牢里，十二岁的大女儿春风，日夜想念我和她妹妹，有时就赶来看我们，见面时，我娘儿俩是骨肉情四行泪，离别时，又恋恋不舍泪四行。二儿子六岁，在家靠奶奶，三儿子三岁没法养活，寄给江南葛村姨娘家（姓解）抚

养。（按：叫解金荣，现在上海工作）

我一家就这样东流西散，骨肉分离了几个月后，由一个本家哥哥王用九做保，我才被释放回来。为了躲避吃二遍苦，坐二次牢，我带着二儿子桂荣移住到西沙王安（按：是王言同志的学生，地下党员）家，一段时间后，又到中心沙唐习章家，住了半年多。这时（四〇年底）王龙已调到扬中任扬中县长。因此，更要提防敌人搜捕，于是经常移动，躲在熟人家，隐姓埋名，假说是这东家的本家，丈夫在上海谋生。每当听到风吹草动，只好从东家跑出躲到沟头岸坎，村边野外，通宵露宿。那两岁的女儿，坐牢时就受了磨难，加上这段时间的流浪、惊吓、折磨，不久，就生病夭亡了。四三年，我居住在西沙三桥王龙同学（刘如模）的家中，后来这个庄上驻了鬼子的一个清乡团，他们挨家挨户地清查户口，有没有“窝藏”新四军家属；如果查出来，那家就要遭殃。为了不能让人家为我们担惊受怕，我只好带着儿女，一家四口（大儿子也离开中心沙到了我身边），搬到大路北分张村娘家，那时我娘家只有弟媳姑娘俩，陡添我们母子四人，一来生活有不便，二来也容易引人注意。而这时，家中婆母早在贫困忧愁中去世，门庭也无人撑持，于是就到兴隆来找定和乡两面派乡长，托他照顾点，他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这样我们母子四人辗转迁移，东躲西藏，先后在段家桥、姚家桥、直溪桥、珥陵、大路、中心沙、西沙等十几户人家落脚，留住了五个年头。到一九四三年四月才回到码头街自己的家。

在西沙落脚期间，我曾为地下党组织做过秘密交通工作。因为西沙对岸的西新桥码头附近有个斧头街，斧头街土地庙里住着和平军。从西沙来扬中，必须从这儿经过。妇女

来往，敌人不大注意，若遇男子汉，敌人就要搜查盘问。所以王龙多次让我给长旺二墩子地下党员张秀明、四墩子地下党员李松廷送信，后来，敌人对妇女也要搜查，因此，想法子要把信藏好，有时藏在棉裤脚管的贴边里，有时藏在鞋底的夹层里面。

记得一九四二年一月，王龙带领部队拔掉了东新港施光福的据点，反动政府因此恨之入骨，第二年五月，王龙深夜回家探母，被敌人发现，又来抄我的家。这次家中又被抢劫一空，就连来跟婆母做伴的邻居带来合用的一顶帐子也被抄去。从姨娘家回来的三儿子真荣的衣裳、鞋子也都抄走了。见到家中这一片荒凉、冷落的样子，我又忍不住伤心落泪。我把过世的婆妈妈的一顶破旧不堪的坏帐子补补连连，来抵御夏夜蚊虫的叮咬，这顶帐子常坏常补，每洗一次都要补几个洞，已补了六十多个洞了。最后，我捧着那顶帐子，几十年的苦水又翻腾开来，暗暗抹了几把眼泪。那三间破草房也是洞洞眼眼，请人简单修补一下，勉强抵御寒风冰雪。提心吊胆，痛苦熬煎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四五年，抗战胜利了，谁知更大的不幸又落到了我的身上。这一年九月七日，是农历的八月初二，王龙在谏壁江边不幸遇敌牺牲。他为革命风风雨雨，出生入死，转战八年，吃了比我更多更大的苦，竟没有见到革命的胜利，没有得到一天的安乐！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政府对我很关心。解放战争中，新四军北撤时，党组织也让我跟随部队北撤。王龙生前知道斗争形势险峻，要随时准备牺牲，所以他早就叮嘱过我，说他如果牺牲，女孩不要出嫁，男孩不要经商，要继承他的志愿，坚持革命，斗争到全国解放。于是我把十八岁的女儿春凤和十六岁的儿子侠荣送到部队，让他们随军北撤了。二儿

子、四儿子因年龄太小，为了不给组织增添麻烦，我就和两个小孩留在家中。

新四军走后，反动派经常到我家来查户口，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跟“奸匪”走了。我死活不承认这事，但心里却时刻记挂着这两个孩子。第二年五月份，我和别人一起去高邮探望他们。路上每逢码头，都有反动派盘查。我人坐在船上，脑子里只想着部队的儿女，自去年九月离家后，已经八个多月不知信息不见人，不知他们可好，十六岁、十八岁的孩子远离家乡，远离亲人，饥饱冷暖，虽说在革命队伍里有组织关心，有同志们照顾，但在那个环境里，条件差，形势险，肯定是受尽难，吃尽苦，我做娘的心里有咽不完的苦水流不完的泪。船到谏壁靠站了，我不由又想起在这儿牺牲的亲人，我心里说：“亲人啊！你为革命献身了，我已按照你说的，把春风和侠荣送到部队去了，你要是有灵，就陪我一起去看他们吧……。”一路上，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饿，光呆坐着流泪，只是在怀里的孩子哭叫时才想起饥渴。一天，到了六圩，因为船被国民党扣查，一天半没靠码头上岸了，所以乘客都下船歇脚吃饭，弄船的老板见我只是搂着孩子发呆，就上岸买了点米，在船上的小锅里煮了点粥给我娘儿俩充了个饥。就这样，坐了七天船，才到了高邮，见到了陈光、韦永义等领导。晚上，他们热情招待我，我看看桌子上的饭菜，哪里吃得下。我想，革命快要胜利了，王龙同志要是活着，和他的战友并肩战斗，那该多好！可是，他却永别了，再也不回来了。因此，我更想急于见到我的一双儿女——春风和侠荣。第二天，组织上派人送我又乘了一天船，到了一个叫临泽的地方。当时，同志们正在吃面糊糊晚饭，我见到了侠荣。他在那儿一遍正作，一边上学，这是组织对他们的关怀

和培养。见了这些，我才放下心。只是女儿在兴化，因故没去成。在临泽，我住了一天，就急急忙忙回来了，因为家里正当农忙。赶回家一看田里的小麦，三股有两股给人偷走了。

不久，国民党反动区公所的家伙闯进我家，说有人在船上看到我去联络共产党，将我毒打了一顿。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东台人。当时这个家伙对我边打边骂道：“老子揍你一顿，就不带你走了。”打完以后，还在屋里查抄了好一阵。

打这以后，我和儿女三年不通信息，只能在心里挂挂。白天心不安，晚上睡不着，又不敢对人说。有时听到好消息，不由得一阵高兴，若是听到不好的消息，就不住的耿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上，突然到处响起枪声。村上群众都纷纷躲到家前屋后的地洞里，好几个邻居跑来叫我躲起来，当时我已上床睡觉了。我说，“我不害怕，你们回去吧！”大家怕我不安全，非让我睡到地板上不行，说枪子没有长眼睛。第二天，又有人跑来告诉我说新四军打回来了。开始我还不大相信，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才有点相信。其实，我多么希望新四军快打回来呀，那个黑暗的社会早就该结束了！我更盼望早点看到我的两个孩子。整个上午，我十分留心外面的动静，不时地打开后门，朝港后张望。中午，我看到后港对岸有部队由西向东走，老百姓见了都慌张地躲藏回避，只见部队里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这时我才透了口气，真是共产党的队伍打回来了，扬中解放了，老百姓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可是侠荣和春风怎么不回来呢？又过了一天，钱汉珊同志来慰问我。他亲热地询问我们家庭这几年的情况，又表示了对王龙同志的怀念。他走后，我的心真是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王龙参

加的革命斗争终于胜利了；悲伤的是，可怜他没有见到这个胜利，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想着想着我又想到了我的两个孩子，更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可他们总不来信，直到两三个月后，侠荣才从扬州来了封信，接到信，我立即到扬州看望了他一趟。又过了四五个月，春风才来信，直到五三年才和她见面。娘儿俩分别八年，见面时的心情是什么滋味，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这时，她已经到了吉林省，在部队的卫生院工作。眼见我的孩子都能继承了父亲遗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做母亲的真为他们高兴，也为王龙同志高兴。

解放后，扬中县长陈忠廉同志让我到无锡参加军烈属代表会议。会上，我和有关领导及其他军烈属代表共庆革命的胜利，告慰先烈。

无锡会议后，领导上希望我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抗美援朝时，我动员鼓励乡亲们送儿女保家卫国；统购统销时，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合作化运动中，我又去向群众做说服动员工作，大家出于对党的赤诚，对王龙同志的怀念，对我的信赖，都能听从我的劝解和鼓励，支持了我的工作。我想，过去，无数同志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生命，今天，我为党做点工作也是应该的。工作中有了点成绩，我心里也踏实了。

一九五六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玉梅口述

王立荣记录

袭击伪政府 活捉伪县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军拔除了老郎、油坊、八桥等敌伪据点以后，扬中抗日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四五年三月，我们在八桥吓退伪军唐德池团，接着又消灭了一批鬼子兵；五月三日四日，又再次摧毁了油坊、老郎、兴隆、三潜、大帝庙等伪军据点。这时候，敌伪在扬中的统治中心三茅镇，已经相当孤立了。如何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胜利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县委的几个同志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主张进攻三茅镇，有人主张先把三茅镇以北的据点扫清，使三茅敌据点完全孤立起来，最后再去攻占。大家根据调查的情况，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进攻三茅镇，袭击伪政府，活捉伪县长章谋。

当时，三茅除伪县政府外，还有伪警察局、伪保安队，加上鬼子兵共三百多人。要想攻占这个据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们商定用武装进攻和内线工作相结合的办法，突进三茅镇，活捉章谋。

章谋是一九四三年敌伪“清乡”后期接替丁雨林就任扬中伪县长的。他原是“镇江清乡主任公署”主任秘书，是清乡主任袁殊的亲信，北平大学毕业生，老国民党员。他曾在上海新闻报馆任职十多年，还当过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敌当头的时节，竟想过官瘾，发国难财，参加汪伪组织，当了汉奸。他走马上任后，居然

想同抗日民主政府较量。他提出赏格：“活捉施光前的，赏米四百担；通风报信，抓到或打死施光前的，赏米二百担。”一个躲在乌龟壳里，靠鬼子刺刀维持其统治的汉奸县长，竟敢说这样的大话，真是痴人说梦。我们县干部和警卫营指战员，对章谋这一套嗤之以鼻。有的同志说：我们号召活捉章谋，谁捉到，记大功一次。

抗战几年来，我们在建党、建军外，还重视搞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敌伪军工作。我们在不少敌据点里，争取了一批汪伪人员。有的经过长期考察，表现确实好的，已被我们吸收入党。三茅镇就有几个这样的地下党员，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地位，与敌周旋，为革命做有益的事。

我们根据上述主、客观情况，绘制了敌伪兵力分布图，提出了初步作战方案。我和县委书记洪天诚同志一起到新老洲将作战方案向地委和军分区领导作了汇报。上级领导详细询问了具体情况，指出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并且作了具体指示，批准了我们袭击三茅镇的计划。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是我们进攻的日期。内外配合是我们进攻的办法。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和洪天诚同志从兴隆出发，由封头坝秘密交通站站长秦德典同志把我们送到秦家祠堂交通站站长方国栋的学校住下。这里离三茅镇约两公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叫方国栋把联络员朱老师请来，由朱进据点把打入伪县政府任职的我地下党员王庆祥，圈东乡“两面派”乡长郭少俊都找来，共同商量怎样把两名短枪队员带进据点。他们认为短枪队员冒充“乡丁”，跟在他俩后面，两支短枪和四个手榴弹由他们带。这样进据点的时候，门岗就不会盘查，不会出问题。

上午十时左右，郭少仪、王庆祥带着我们的两名短枪队员，按计划顺利地进了据点，隐藏在伪县政府原财政科长陈爱棠家里。陈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过去给我们办过一些事情。但这次隐藏新四军武装人员，关系重大。我们指示王庆祥给陈传话，要他照顾好这两个人，这是一次立功的机会；如果走漏了消息，发生了意外，要他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交代短枪队员，一听见南门枪声，就立即赶到伪县政府后门口，等候伪县长章谋出来，抓个活的。

另一项安排是：我们派伪保安大队排长郭加隆的妻子进入三茅据点，通知她的丈夫，说施县长于今夜十一点有要事进城，要他在这个时刻控制住防守南碉堡的伪军，不要过问进档子的人。郭加隆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他手下的一个排负责防守南碉堡。我们利用郭加隆的关系，可以从南门突进。

关于外围进攻。我们派警卫员艾佩兰同志带着我的信赶到新老洲送给军分区司令员韦永义同志。韦司令见信后，当即召开干部会议，当晚下达命令，亲自带领两个连的兵力，由艾佩兰带路，分乘十只木船，过江后以急行军赶到三茅镇南的卞家桥的南边，与我县警卫营一个连会合。部队由韦司令统一指挥。具体部署是：用一个连佯攻日寇驻防的西据点，钳制鬼子，使他们不能支援伪军；用两个连兵力，攻击东、南、北各据点的伪军，包括伪警察队和伪保安队。同时收拾伪县政府机关。

内部、外部的力量，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伪排长郭加隆于十点四十分到南碉堡查岗，他上下看了一遍后，并未走开，就在那里聊天。还把炮楼上的伪军也叫下来听他排话。正十一点，我军一个精干班从南门突进，首先占领南碉堡。

紧跟着，一个连的战士涌了进去。守南门的一个排伪军，因为都围拢在郭加隆身边，炮楼上已没有一个人。我军从南门进入三茅，按计划连放三枪。隐蔽在陈爱棠家里的短枪队员，迅速赶到伪县政府后门口。这时候，伪县长章谋果然从县政府后门出来了。这是他的老习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开后门向西据点鬼子那里跑。他知道伪军不中用，靠鬼子才保险。但这次情况变了，此路不通。我短枪队员听到开门声，就向县政府后面的小河里扔了一枚手榴弹，轰隆一声，章谋吓得魂飞魄散，随即退回屋里，瘫倒在地板上，随身带的手枪和快慢机也被甩到一边。我们的战士趁着硝烟冲进伪县政府，把章谋活捉了。

我军从南门打开缺口后，伪军防线也被突破，大街小巷都有新四军的喊杀声。西据点那边，我军向碉堡射击，敌人从里面还击，激烈的枪炮声震动全城。伪军以为被新四军包围住了，他们本来战斗力就很弱，这样一来，便土崩瓦解了。所有警察队和保安大队人员，除少数逃散外，大部分做了俘虏。

解决了这两部分伪军之后，我军战士又打开监狱，放出被敌人监禁的我乡村干部和无辜群众。他们一出监狱，就投入战斗，帮助我军押送俘虏，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

战斗在进行着，韦永义司令员和我们县委几个负责同志都集中在三茅镇南卞家桥附近的一个竹园里（指挥所所在地）等待捷报。过了一会儿，我两名短枪队员押着伪县长章谋来了。我早就听人说过，章谋是个瘦弱的文人，不懂军事，但没有想到，他简直象个鸦片鬼，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面孔如黄纸一般。他一见到我，两眼发愣。我主动说，“我就是萧光前”。这一说他更害怕了，身子不住地发抖。我说

“我们不杀你，不象你们，抓了就杀。我们共产党有优待政策，要杀你，就不会把你带到这里来了。”他轻轻“嗯”了一声，那极度惊恐的神色，才稍稍缓和了一点。

我们把几个重要的俘虏查问了一下，交警卫营管押后，又趁着黑夜把部队撤到兴隆镇以南。

这次战斗，共俘伪县长以下六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七十余支。原来预定的“攻打三茅镇，活捉伪县长”的计划实现了。尽管章谋是日寇手中的一个傀儡，但毕竟是汪伪政权的一县之长，抗日战争期间丹北地区活捉伪县长，这是首次。

战斗结束后，分区司令员韦永义同志把章谋带到新老洲，经上级同意，把他教育释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向我调查了解章谋的问题。我从调查人口里得知，解放以后，章谋在山西太原工作。至于他的详细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施光前